

《大事记续编》引唐实录佚文真伪发微^{*}

杨永政

内容摘要:唐实录是唐史研究的关键史料,在宋代尚多见征引和收藏,宋以后几乎难觅踪迹。元末王祜的《大事记续编》征引大量唐宋佚籍,其中包括唐实录和宋敏求补晚唐实录四十条,学界对其性质认识多有不同。通过溯源比较,可考定这些实录有明引或暗引《资治通鉴考异》者,有采自《容斋随笔》等宋代文献者,均非对唐实录原文的直接引用。书中有七条宋敏求补撰的唐实录不见于其他传世文献,系从已佚的宋人著作中转引而来,可用以补充唐人生平、解读两《唐书》中语义模糊的文句、考察宋敏求补撰唐实录的议论体例,具有重要价值。《大事记续编》转引唐实录的现象,说明唐实录可能亡于宋元之交,并未传至明代。面对古书征引的佚籍时,应当在审慎辨析的基础上再加利用。

关键词:《大事记续编》 王祜 唐实录补 唐实录 宋敏求

引言

唐实录是由唐代历朝官方纂修,并由北宋宋敏求等后人续补而成的一系列编年体史书,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等史籍的重要史源。然而,除《顺宗实录》五卷尚存于韩愈文集中外,唐实录原文几乎全部散佚,仅可从后世文献征引中拾得吉光片羽。其在两宋尚见《册府元龟》抄录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王应麟《玉海》等文献征引,宋以后则难觅踪迹。唯元末明初之《大事记续编》征引唐实录四十条,显得极为特别,备受学界关注。

^{*} 本文系 2022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明代丛书编刻与社会文化”(KYCX22_0041)阶段性成果。

《大事记续编》(以下简称“《续编》”)七十七卷,是王祎^①续补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而成的编年体通史,条载汉武帝征和四年(前 89)至后周显德六年(959)间的历史大事,征引包括唐实录在内的大量唐宋佚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即认识到《续编》保存佚书之功,称:“宋庠《纪年通谱》久无传本,刘羲叟《长历》仅《通鉴目录》用以纪年,书亦散佚。此书间引及之,亦可以备参稽。至前贤议论,荟萃尤多。”^②近年来,学者也利用《续编》辑出了诸多佚籍^③。就唐实录而言,黄楼利用《续编》征引的武宗和宣宗实录探讨了会昌、大中之际的政治局势^④。谢贵安亦根据《续编》的征引推测唐实录的亡佚时间,认为:“元代后期该(引者按,指武宗、宣宗、僖宗、昭宗)实录可能尚存于世。唐实录在明清两代最终不存。”^⑤

在发掘利用《续编》所引佚书的同时,也有学者对《续编》引书的可靠性提出过质疑。岳珍指出《续编》中的杜佑《理道要诀》出自转引,王祎本人并没有见到《理道要诀》原书^⑥。张固也、熊展钊亦指出《续编》引书“往往一条记事却合引两种乃至多种古书,让人无法求证真伪”,“是煊博而已”^⑦。不过,这些质疑只是推测性的,并未对《续编》的引书特点进行全面考察。本文尝试在厘清唐实录流传情况和《续编》引书体例的基础上,考察此书所引四十条唐实录的可靠性和文献价值,并借此讨论唐实录的亡佚时间。

①王祎(1322—1374),字子充,号华川,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明史》卷二八九有传。其名在史籍中常误作“祎”,董刚对此已有辨正。详参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附录《关于王祎的名字》,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包伟民指导),2004年,第103—104页。故本文引用史籍如遇误字则括注正字。

②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大事记续编》提要,中华书局,2003年,第429页。

③阮廷:《宋志史部佚书考略》,邓广铭、漆侠主编:《中日宋史研讨会 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26—452页。刘纬毅辑:《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刘纬毅等辑:《宋辽金元方志辑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刘纬毅等辑校:《汉唐地理总志钩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

④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6,67—68页。

⑤谢贵安:《中国已佚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⑥岳珍:《杜佑〈理道要诀〉辑考》,《文献》2004年第3期,第100页。

⑦张固也、熊展钊:《陈岳〈唐统纪〉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1期,第22页。

一、《大事记续编》直接征引唐实录的可能性

(一)唐实录和补实录在后世的流传

唐实录的纂修和续补,在史籍中有较为清晰的记载,但其具体流传情况和亡佚时间仍有模糊之处^①。大体上,武宗以前诸朝实录,或为当朝所修,或为新帝即位后追述前朝史事,但均纂成于唐代。《武宗实录》三十卷约成书于咸通年间,五代时仅余残本一卷。武宗朝以后的晚唐五朝(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实录,因时局动荡并未在唐代修成。后晋天福六年(941),贾纬“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已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②,可视作补撰晚唐实录的尝试。北宋庆历五年(1045),宋敏求依据贾书和其他史料成“《会昌实录》二十卷,宣、懿、僖、昭《实录》各三十卷,《哀帝实录》八卷,合一百四十八卷”^③,补全了晚唐六朝实录。

唐实录成书后,并不像明清实录一样深藏于宫禁之中,而是允许官员阅读与抄写。如贞观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实录》纂成后,“仍遣编之

①关于唐实录纂修、续补、流传和亡佚的研究,有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114页;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中华书局,2015年,第5—12页;孙永如:《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2期,第6—10页;[英]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6—141页;唐雯:《〈太平御览〉引“唐书”再检讨》,《史林》2010年第4期,第70—76、189页;唐雯:《晏殊〈类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9—138页;唐雯:《〈顺宗实录〉详本再审视——兼论唐实录的辑佚》,叶炜主编:《唐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89—216页;谢贵安:《中国已佚实录研究》,第17—24、54—265页;罗瑾歆:《唐初三朝国史与实录纂修关系考》,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三十五辑,三秦出版社,2022年,第317—335页,等等。关于唐实录的亡佚时间,谢贵安说见前引,黄永年认为,“宋以后唐代实录除顺宗一朝外都已佚失,仅《资治通鉴考异》引用若干片段”(第10页)。

②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三一《贾纬传》,中华书局修订本,2015年,第2008页。相关记载亦见于《五代会要》卷一八、《册府元龟》卷五五四。按,对贾纬《唐年补录》的研究,详参郭桂坤:《贾纬及其〈唐年补录〉》,《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25—32页。

③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十四,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52页。

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①。开元年间,洋州刺史赵匡甚至倡议将实录作为科举考试科目:“其史书,《史记》为一史……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②足见唐实录在当时流传之广。

两宋时期,唐实录和补实录未见刊印,但传抄较广,多见收藏、阅读和征引的记录。以书目著录而论,官书目录《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以及私家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尤袤《遂初堂书目》^③几乎著录了唐代历朝实录,也兼及贾纬和宋敏求的补实录,详见表 1:

表 1 宋代书目著录唐实录、补实录情况

书目 实录	崇文总目	宋史·艺文志	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 解题	遂初堂 书目
高祖实录	二十卷	二十卷	二十卷	二十卷	唐十五帝实录
太宗实录	四十卷(阙)	四十卷	四十卷	四十卷	
高宗(后修)实录	三十卷	三十卷	三十卷	十九卷(本三十卷,今阙十一卷)	
则天实录	二十卷	二十卷	二十卷	二十卷	
中宗实录	二十卷	二十卷	二十卷	二十卷	
睿宗实录	十卷、五卷 ^④	十卷、五卷	十卷	十卷	
玄宗实录	一百卷	一百卷	一百卷	一百卷	

①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卷六三《史馆上》,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932页。句读小有改动。

②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十七《选举五》,中华书局,1988年,第423页。

③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33页。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5088、5089页。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4—223页。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3—126页。尤袤:《遂初堂书目》卷一,清《海山仙馆丛书》本。按,五部目录均能反映宋代藏书的实际状况:《崇文总目》是北宋庆历以前秘阁藏书的实际记录;《宋史·艺文志》是元人依据宋代四种国史艺文志撰成,基本代表了宋代宫廷藏书的整体情况;《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是南宋私家藏书的实际记录,大体上反映了理宗朝以前社会上的文献流传情况。

④笔者按,十卷本题《太上皇实录》,五卷本题《睿宗实录》。

续表

书目 实录	崇文总目	宋史·艺文志	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 解题	遂初堂 书目
肃宗实录	三十卷	三十卷	三十卷	三十卷	唐十五帝实录
代宗实录	四十卷	四十卷	四十卷	四十卷	
建中实录	十卷	十五卷 ^①		十卷	
德宗实录	五十卷	五十卷	五十卷	五十卷	
顺宗实录	五卷	五卷	五卷	五卷	
宪宗实录	四十卷	四十卷	四十卷	四十卷	
穆宗实录	二十卷	二十卷	二十卷	二十卷	
敬宗实录	十卷	十卷	十卷	十卷	
文宗实录	四十卷	四十卷	四十卷	四十卷	
武宗实录(唐人修)	一卷		一卷(今存止会昌元年正月、二月)		
唐年补录(贾纬补撰)	六十五卷(阙)			六十五卷	
武宗实录(以下皆宋敏求补撰)	笔者按:《崇文总目》成书早于宋敏求补实录,故未著录	二十卷		三十卷 ^②	
宣宗实录		三十卷		三十卷	
懿宗实录		二十五卷		二十五卷	
僖宗实录		三十卷		三十卷	
昭宗实录		三十卷		三十卷	
哀帝实录		八卷		八卷	

由表 1 可知,两宋诸目录所载武宗以前唐实录的卷数基本没有差异(唯《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高宗实录》“今阙十一卷”,及《遂初堂书目》仅著

①“十五卷”或为“十卷”之讹,当承自《中兴馆阁书目》。《玉海·艺文》引《中兴馆阁书目》云“《唐建中实录》十五卷”(《玉海艺文校证》卷十四,第 647 页)。
②“三十”系“二十”之误,至于其撰人作“监修韦保衡”,更是馆臣误补。《玉海·艺文》引《中兴馆阁书目》作“《会昌实录》二十卷”(《玉海艺文校证》卷一四,第 652 页)。

录“唐十五帝实录”,显然有阙),这说明武宗以前各帝实录在南宋中期尚流传有绪,仅有少量亡佚。至于贾纬《唐年补录》和宋敏求补实录,据《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可知,二书在南宋后期仍有流传。

书目著录之外,唐实录和宋敏求补实录亦多见宋人阅读和征引。北宋真宗时《册府元龟》唐五代部分即采各朝实录、国史及《唐书》修成(晚唐部分主要采自《旧唐书》),惜未标明出处^①。真宗、仁宗时,晏殊《类要》征引高祖至文宗十一部实录百余则(此时宋敏求补实录还未成书)^②。神宗间,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征引了包括宋敏求补实录在内的各朝唐实录。南渡以后,绍兴年间邵博《闻见后录》引《穆宗实录》“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条^③;约淳熙末,陆游《老学庵笔记》引《高祖实录》“武德二年正月甲子”条^④;约宁宗时,王明清《挥麈录》引《明皇实录》“开元十七年秋八月”条^⑤;绍熙、庆元间,洪迈《容斋随笔》谓“予读《昭宗实录》”“偶阅《唐昭宗实录》载一事云”等等,又征引宋敏求补《昭宗实录》原文^⑥;庆元间,黄处权编刻《莆阳黄御史集》时截取宋敏求补《昭宗实录》千余字刻入《附录》^⑦;约宝庆间,《岁时广记》征引《明皇实录》三次、《睿宗实录》一次^⑧;宋末,王应麟《玉海》征引唐武宗前历朝实录两百余条及宋敏求补撰《武宗实录》一条、《宣宗实录》五条^⑨。可见,至南宋

①岑仲勉:《册府元龟多采唐实录及唐年补录》,《唐史余瀋(外一种)》,中华书局,2004年,第234—236页。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前言,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②唐雯:《晏殊〈类要〉研究》,第109—150页。

③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220页。

④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第110页。

⑤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⑥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卢知猷》,三笔卷六《唐昭宗赠谏臣官》、卷七《宗室补官》、卷十五《总持寺唐敕牒》,中华书局,2005年,第390、502、504、610页。

⑦详参李最欣:《〈黄御史集〉所含“〈唐昭宗实录〉片断”之来历和作者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2期,第13—17页。

⑧陈元靓撰,许逸民点校:《岁时广记》卷十《开重门》、卷十一《偷新曲》、卷二九《讲道经》,中华书局,2020年,第195—196、224、573页。

⑨详参刘圆圆:《〈玉海〉实录问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汤勤福指导),2010年;肖光伟:《〈玉海〉所引隋唐五代文献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俞钢指导),2011年。

末年,武宗以前实录基本尚存于世,宋敏求补实录或许有所亡佚,但仍存有武宗、宣宗至少两朝的部分文字。

至于贾纬《唐年补录》,北宋时,乐史《广卓异记》征引三次,《太平广记》有五处“出《唐年补录》”,晏殊《类要》征引三次,《资治通鉴考异》征引三十余次。但此书在南宋则征引不多,淳熙间《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三二、卷五五引王庭凑事两条,其中前者又被《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八转引^①。宋末元初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虽评价《唐年补录》“乃末学肤受者之为耳”^②,但系就《考异》所引《补录》文字而发,应当并未看到《补录》原书。这或许是由于宋敏求补实录替代了《唐年补录》的功能,使后者在南宋时日渐式微,在宋元之交已难以得见。

从宋代的书目著录和征引情况来看,终有宋一代,武宗以前的唐实录虽有所散失,但大体上较为完整。贾纬《唐年补录》和宋敏求补撰晚唐实录在南宋末或许已有较多散佚,《唐年补录》甚至可能已经不存于天壤间。

而宋代以后,唐实录、补唐实录和《唐年补录》再不见于藏书目录的著录^③和《续编》以外文献的征引。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籍,亦未见唐实录之踪影,这或许说明唐实录及补唐实录至迟在明永乐间就已完全散失。又,明代文渊阁藏书继承自宋元内府,而正统六年(1441)《文渊阁书目》不载唐实录和补唐实录^④,甚至可以推测元代朝廷官书中已经没有唐实录和补唐实录了。

①《锦绣万花谷》对宋代类书的因袭,详参李更:《渊源与流变——从〈锦绣万花谷续集〉看南宋坊贾之类书编刻》,《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4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167—202页。

②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8045页。

③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和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等书目虽然也著录了唐实录,但前两者为抄撮前代书目而成,后者系据《文献通考·经籍考》等文献增窜之伪本,皆不能据以考察当时的实际藏书情况(详参李丹:《明代私家书目伪书考》,《古籍研究》2007年上卷,第137—139页)。

④此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文渊阁书目》有三种版本系统,分别代表文渊阁不同时期的藏书面貌,其中四库本系统是“正统六年杨士奇等整理藏书时所编写的目录定本”(详参刘仁:《〈文渊阁书目〉版本系统考论》,《文献》2019年第4期,第119—133页)。

(二)《大事记续编》的成书时间和地点

《大事记续编》现存明成化甲辰(二十年,1484)序刊本^①和《四库全书》抄本,但诸本序跋及历代史籍皆不载其成书时间,仅可通过王祹的生平^②略作推测。

王祹师从柳贯、黄潛,为金华学派重要人物。至正十八年(龙凤四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取婺州,征王祹为中书行省掾史,其后历任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掌起居注、漳州府通判等职。洪武二年(1369),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修毕旋遭排挤,三年七月左迁赴甘肃。五年正月,出使云南招降元朝旧部,六月被杀害。诏赠翰林学士,谥文节。

至正十八年以后,王祹留下的文字多为诏令、奏议和应酬之作,恐怕没有时间和精力创作卷帙浩繁的《续编》。相反,在元末至正十五年到十八年,王祹“知世道终不可为,乃归隐青岩山中,著书立言”^③,有充裕的时间从事著述,其《青岩丛录》《华川卮辞》稿本即纂成于隐居时期^④。此外,与王祹同时代的俞恂为其作《家传》,在行文上将著《续编》之事置于“结屋青岩山中以居”与“岁戊戌十二月,大明皇帝亲取婺”之间^⑤,显然是认为《续编》成书于隐居之时,与《行状》之言亦可相互印证。

因此,推断《续编》当成书于元末王祹隐居青岩山期间,约在至正十五至十八年。此时唐实录和补唐实录应已亡佚或很难得见,被《续编》直接征引的可能性极小。不过,若要得出可靠的结论,仍要从文本内部出

①笔者所见成化本《大事记续编》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四部藏本,《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出版社,2011年)史部第5、6册据国图本影印。诸本卷首之序文识语,国图本阙,内阁本版片漫漶不可辨,静嘉堂本为抄补,唯南图本首尾俱全。但为便于读者检核,本文所引《续编》原文据《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印本。

②详参徐永明:《元代至明代婺州作家群研究》第五章《王祹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11—593页。

③郑济:《故翰林待制华川王公行状》,王祹著,颜庆余整理:《王祹集》附录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29页。

④王祹《青岩丛录序》曰:“向予读书青岩山中,遇有所见,辄抄以为书,谓之《丛录》。”《华川卮辞序》曰:“至正戊戌之岁,自秋徂冬,予挈家避兵县南,往来风林、香溪之间。朋友离散,又绝无书可观。心邑郁不自聊,间因追忆畴昔所闻见者,志之于简。”(《青岩丛录》《华川卮辞》卷首,同治九年序刊《金华丛书》本)

⑤俞恂:《翰林待制华川先生家传》,《王祹集》附录二,第805页。

发,结合《续编》的引书特点和具体文字来判断。

二、《大事记续编》的引书特点

《续编》的编纂体例以年为纲,于每年之下条列本年的大事条目,标明“以某书修”,条目之后常附有解题,广引群书以补充史事细节、评价历史事件,多数也标明出处。正文及解题的引书约有数百种,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历代纪传体正史,以及《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通鉴目录》、《稽古录》等当时常见的编年体史书。第二类是数量众多的别史、杂史、政书、笔记小说等文献,其中不乏今日罕见的佚书,如杜宝《大业杂记》、窦苹《唐书音训》、宋白《续通典》、宋庠《纪年通谱》等等。然而这些文献中的相当一部分实非王祯所亲见。

兹以全书开篇第一条大事记及其解题为例,分析《续编》的引书体例和特征,即可知其实况。其原文如下(为便于分析,数字序号为笔者所加):

①汉孝武皇帝征和四年。春,正月,帝幸东莱,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谏,弗听。大风海涌而止。(以《通鉴目录》《稽古录》修)②二月丁酉,雍县无云如雷者三,陨石二。(以《本纪》修)③三月,帝耕于钜定。(以《本纪》、荀悦《汉纪》、《稽古录》修)

解题曰:④武帝一《纪》,征伐、宫室、祭祀、诗乐之事,无岁无之,独农桑之务未尝及焉。至是始亲耕钜定,是殆悔心之萌乎?轮台悔过之诏,富民搜粟之封,兆于此矣。(⑤应劭曰:“齐国县。”《地理志》齐郡:“马车渎首受钜定,东北入海。”)①

先将①与其标注的出处《通鉴目录》《稽古录》进行对比。《通鉴目录》云:“上幸东莱,欲浮海求神仙,遇风而止。”②《稽古录》云:“春,帝幸东莱,临大海。”③与《续编》相比,二书缺少“群臣谏,弗听”和“海涌”两个细节。再检《通鉴》,发现文字俱全:“春,正月,上行幸东莱,临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谏,上弗听;而大风晦冥,海水沸涌。上留十余日,不得御楼船,乃还。”④也就是说,①的内容溢出了《通鉴目录》《稽古录》的范围,

①王祯:《大事记续编》卷一,《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5册,第489页。

②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卷三,《四部丛刊》影印北宋刊本,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1919),第1册,第233页。

③司马光:《稽古录》卷十二,《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第2册,第70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二,第737—738页。

却被《通鉴》完全涵盖。因此有理由怀疑本条文字是据《通鉴》所修,而非王祎标注的“以《通鉴目录》《稽古录》修”。

再对比②与《史记》《汉书》原文。《史记·武帝本纪》不载此事,《汉书·武帝纪》有“二月丁酉,陨石于雍,二,声闻四百里”^①,却无“雍县无云如雷者三”八字。此八字见于《汉书·郊祀志下》^②,《通鉴》又截取《郊祀志》文字作:“二月,丁酉,雍县无云如雷者三,陨石二,黑如黧。”^③与《续编》的文字几乎相同且内容更为丰富。可见,②与①的情况相似,文字范围均溢出了王祎标注的文献出处,而是很可能直接采自《通鉴》。

来看③,仅有短短七个字,却标注了三种来源文献。其中《汉书·武帝纪》确有“三月,上耕于钜定”^④一句,与《续编》几乎相同。《汉纪》云:“三月,上行幸钜定”^⑤,只云“行幸”,未言耕作之事,与《续编》不同。《稽古录》则不载此事。再检《通鉴》,作:“三月,上耕于钜定。”^⑥与《汉书》和《续编》文字相同。这意味着《续编》此句可能是根据《汉书·武帝纪》或《通鉴》修成,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以“《汉纪》《稽古录》修”。

再看解题部分。首先是王祎自己的史评(④),指出汉武帝亲耕钜定,是对其早年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之政策的反思,此后武帝便有轮台悔过之诏,政策转向休养生息。这些文字行文上虽无引用痕迹,系王祎本人所作,但从思想实质上说,应当仍是承自《通鉴》。《通鉴》在论及“上耕于钜定”和“轮台悔过之诏”时用大量笔墨表现武帝的悔过,如“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云云^⑦,这些评论皆是司马光的发明^⑧,《续编》的史评应当亦是承此说而来。

最后是解题中用以补充史料的小注(⑤)。“应劭曰”和“《地理志》”

①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210页。

②《汉书》卷二五下载:“是岁,雍县无云如雷者三,或如虹气苍黄,若飞鸟集械阳宫南,声闻四百里。陨石二,黑如黧,有司以为美祥,以荐宗庙。”(第1247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第738页。

④《汉书》卷六,第210页。

⑤荀悦撰,张烈点校:《汉纪》卷十五《孝武皇帝纪》,中华书局,2002年,第265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二,第738页。

⑦《资治通鉴》卷二二,第742页。

⑧关于司马光此段史论的原创性及其意义,详参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云云出自《汉书》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三月,上耕于钜定”颜注云:“服虔曰:‘地名也,近东海。’应劭曰:‘齐国县也。’晋灼曰:‘案《地理志》,应说是。’”①《汉书·地理志上》齐郡载“钜定”,注云:“马车渚水首受钜定,东北至琅槐入海。”②因此,王祎应当是在撰写③“三月,帝耕于钜定”时参考了《汉书·武帝纪》及其颜注,又根据颜注引应劭、晋灼之语找到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并将应劭和《地理志》之语采入⑤,作为③的补充和史料扩展。

通过以上对《续编》全书第一条大事记及其解题的引书分析,可发现:①②系根据《通鉴》修成,④借鉴了《通鉴》的史论观点,③⑤系根据《汉书·武帝纪》及颜注修成。就《续编》此条所展现的文本面貌而言,难以发现征引《通鉴目录》《稽古录》《汉纪》等史籍的痕迹。

据以上比较可见,《续编》对引书出处的标注存在名不副实的现象,有据甲书修成却标为乙书者,有只据一种文献修成却标注多种文献者。其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只引用《通鉴》或正史却标注其他一种或多种文献。即便是王祎自己阐发的史论,也有因袭《通鉴》的痕迹。面对《续编》征引的传世文献,今人尚能通过文本比较发现其伪托痕迹,那么对其征引的唐实录等佚籍,就更应当审慎辨析。

三、《大事记续编》中转引的实录

《续编》从卷四八隋大业十三年(617)到卷七十唐天复元年(901)的记事中,共征引唐实录四十次,其中武宗以前唐实录二十八次,补晚唐实录十二次③。这些征引是王祎亲见,还是转引自他书?亦或是张冠李戴、虚标书名?今逐一查考史源,发现四十条中有三十三条尚见于其他唐宋文献征引,其中二十五条见于《通鉴考异》,五条见于《册府元龟》等文献,

①《汉书》卷六,第210页。

②《汉书》卷二八上,第1583页。

③统计方法不同,《续编》征引唐实录的次数会有差异。如标注“以实录修”的条目之下的解题中可能会再次提及实录,这种情况只算作征引一次。据《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册影印本的页码,四十次征引分别为第325、325、335、336、346、403、409、412、412、427、429、432、437、439、446、467、474、480、494、494、496、502、503、504、512、522、522、527、531、532、538、539、540、541、553、560、560、565、574、576页。其中第531页以前的28处为武宗以前实录,第531页及以后的12处为宋敏求补实录。下文引用此书之出处,为避免繁琐,只随文括注影印本该册的页码。

一条见于《容斋随笔》，两条为韩愈《顺宗实录》，事实上皆为《续编》据他书转引，或是征引其他文献却标以“实录”之名。现将三十三条分类考证如下。

（一）转引自《容斋随笔》者

《续编》从《容斋随笔》中转引的唐实录仅一条，但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续编》转引实录和标注出处的方式。《续编》卷六九唐僖宗文德元年（888）载：

是岁，赠孟昭图起居郎，常濬礼部员外郎。（以《实录》修）

解题曰：洪迈曰：方时艰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而《通鉴》失书之，亦可惜也。（第565页）

本条是文德元年最后一条大事记，记载二人被赠官之事。其虽标注“以《实录》修”，但在时间上仅知是“是岁”而无具体月份和日期，这与《续编》和实录的编年体例均有不合。再看解题，引用了“洪迈曰”。检洪迈《容斋随笔》，确有相同文字：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内侍田令孜之手。左拾遗孟昭图、右补阙常濬上疏论事，昭图坐贬，令孜遣人沉之于蕃颐津，赐濬死。《资治通鉴》记其事。予读《昭宗实录》，即位之初，赠昭图起居郎，濬礼部员外郎，以其直谏被戮，故褒之。方时艰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鉴》失书之，亦可惜也。^①

僖宗朝，孟昭图、常濬二人被权宦田令孜分别贬死于中和元年（881）和光启元年（885）。洪迈据《昭宗实录》指出，昭宗“即位之初”便向二人赠官，以示平反和褒奖。按，昭宗于文德元年三月即位，次年正月改元龙纪。可知赠官时间确为文德元年，但其具体日期，洪迈并未明言。因此不难推断：本条大事记是依据《容斋随笔》中提到的《昭宗实录》修成，王祚没有亲见实录原文，故而无法确定赠官的具体日期，仅能笼统地标作“是岁”，附载于本年度记事之末。

（二）转引自《通鉴考异》并标明者

《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三十卷，是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形成的史料考证和资料长编性质的副产品，以考证精良和广征博引而著称。《续编》的解题在功能上与《考异》十分相似，亦时常引用《考异》中的考证和史料，也因此转引了一些《考异》中保留的唐实录文字。

^①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三笔卷六《唐昭宗赠谏臣官》，第502页。

此类有八条^①，因明确标明了《考异》之名，故而不难判断其转引性质。其中又可分为如下两类：

1. 直接转引《考异》中的唐实录而不加论辩。如卷四八大业十三年（617）六月己丑“渊子建成、世民拔西河郡”条解题：

《通鉴考异》：“温大雅《创业起居注》云‘命大郎、二郎率众讨西河’。高祖、太宗《实录》但云‘命太宗徇西河’，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唐·殷峤传》‘从隐太子攻西河’，今从《起居注》。”余见《通鉴》。（第325页）

检《考异》原文^②，文字基本相同，确系《续编》对《考异》的直接引用。

2. 转引《考异》所引实录，但加以辨正或反驳。如卷六一建中四年（783）十二月壬戌“李希烈陷汴、郑二州，称帝，改元”条解题：

按《通鉴考异》谓：“希烈称帝，《实录》、《旧·希烈传》《颜真卿传》皆无年月。据《奉天录》《幸天记》及《实录》闰月庚午诏，谓在兴元元年正月初。”今以新旧《史》列传考之，建中四年冬，议改元，加尊号。陆贽奏僭帝者二竖，则其时希烈已僭号矣，不待至兴元也。况新旧《史》皆载希烈入汴州，僭号改元。岂不可考？（第480—481页）

李希烈称帝之日期，司马光以为两《唐书》不载，故据《奉天录》《幸天记》《实录》定为兴元元年初^③。而王祹指出《考异》之疏忽，又据两《唐书》及陆贽奏议^④将称帝之事系于建中四年十二月。

①《大事记续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册，第325、412、446、480、502、522、522、532页。

②《资治通鉴考异》载：“《创业注》云：‘命大郎、二郎率众讨西河。’高祖、太宗《实录》但云‘命太宗徇西河’，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唐·殷峤传》：‘从隐太子攻西河。’今从《创业注》。”（《资治通鉴》卷一八四，第5738页）

③《资治通鉴考异》曰：“希烈称帝，《实录》、《旧·希烈传》《颜真卿传》皆无年月。今据《奉天记》《幸奉天录》，皆云：‘赦令既行，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长恶不悛，国号大楚。’又《实录》，今年闰月庚午，诏曰：‘朕苟存拯物，不憚屈身，故于岁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诚。使臣才及于郊畿，巨猾已闻于僭窃。’然则希烈称帝，必在正月初也。”（《资治通鉴》卷二二九，第7393页）

④陆贽《奉天论赦书事条状》曰：“今重围虽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竖，又有顾瞻怀贰，叛援党奸，其流实繁，不可悉数。”（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十三《奏草》，中华书局，2006年，第414页）

(三)转引自《通鉴考异》而不标明者

《续编》中有部分唐实录文字看似无所依傍,仿佛是直接从原书引用,实则却是暗引《考异》而未标出处。这些文字不仅在内容上完全不出《考异》征引之范围,而且在行文和结构上也与《通鉴》和《考异》高度相似。此类有十七条^①,其中又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

1. 大事记条目之末标注“以《实录》修”,实则是依据《通鉴》《考异》等文献修成^②。如卷五八天宝六年(747)“冬十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条,标注“以《实录》《通鉴》修”(第432页)。《通鉴》的对应条目及《考异》载:

冬,十月,己酉,上幸骊山温泉,(《考异》曰:《旧纪》《唐历》皆作“戊申”,今从《实录》。)改温泉宫曰华清宫。^③

《考异》据实录考定温泉宫改名的时间为“己酉”而非“戊申”。《续编》此条虽仅云“冬十月”而未标明具体日期,但无疑是采纳了《考异》运用实录得出的考证结论。所谓“以《实录》《通鉴》修”,实际上只参考了《通鉴》和《考异》而已。

2. 在长篇解题的开头罗列“实录”等多部书名,标榜解题内容是依据多种史籍而来,实则主要是从《通鉴》和两《唐书》中剪裁而成^④。如卷四八大业十三年“十一月丙辰,唐公渊克长安,约法十二条,除隋苛禁,下马邑郡丞李靖狱,既而赦之”条的解题,以三千余字的篇幅详言李渊攻克长安之始末,今录其首尾如下:

解题曰:按《隋书》、新旧《唐书》纪传、高祖太宗《实录》、温大雅《创业起居注》、柳芳《唐历》、陈岳《唐统纪》:大业十二年,渊为太原留守时,群盗蜂起……义宁元年十一月甲子,渊自长乐宫入京师,以渊为相国,假黄钺,进封唐王。此高祖平长安之本末也。(第325—329页)

此条解题所标注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唐历》《唐统纪》四种佚书,正为义宁元年(617)部分的《考异》所征引。而且,本条解题中还穿插了一段

①《大事记续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册,第325、335、336、346、403、409、412、427、429、432、437、439、474、527、553、560、560页。

②《大事记续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册,第335、412、427、429、432、439、474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第6877页。

④《大事记续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册,第325、336、346、403、409、437、553页。

对《考异》及其征引的《创业起居注》和《太宗实录》的辨正：

《通鉴考异》据温大雅《创业起居注》“唐公顾谓大郎、二郎曰：何如？对曰”云云，“《太宗实录》尽以为太宗之策，无建成名，今从《创业注》”。按《创业注》作于武德时，建成位居上嗣，太宗止藩王尔。所以每事大雅不使太宗独专其名，故并建成言之也。观其谏高祖回师之辞，洞究敌情，辞语明白。建成庸人，岂能及此？今削其名。（第328页）义宁元年秋，李渊因军中乏粮且晋阳有险，与群臣商讨对策。《考异》据《创业起居注》认为世民、建成二人皆建议出兵咸阳^①。《续编》则以《考异》所引《太宗实录》仅有太宗之名，又据《创业起居注》之体例，以及世民、建成之人格差异，认定倡议出兵者仅有世民一人。此段文字虽与《考异》结论相左，但无疑是依据《考异》及其征引的实录修成。

再举两例，《续编》卷五十武德九年（626）正月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及其诸子”条（第346页），其解题详载玄武门之变的始末，首云“按新旧《史》、《实录》”，末云“余见《通鉴》”；卷五八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甲子“禄山反”条（第437页），其解题首云“按新旧《史》列传、《实录》、包胥《河洛春秋》、李匡文《幸蜀记》”，末云“余见《通鉴》”。两处解题虽篇幅较长，但考其内容，无一字溢出两《唐书》、《通鉴》、《考异》以外者，其标注的《实录》《河洛春秋》等文献，实为从《考异》中转引。

3. 解题在史料和行文结构上都承袭《考异》，再对《考异》加以辨正^②。如《续编》卷六五太和四年（830）“二月乙卯，山南西道军乱，害节度使李绹”条解题：

按裴度撰《绹神道碑》：“益部为蛮寇掠，有诏发兵赴救。既行而贼去，不远而军回。监军杨叔元者，惮公守正不可寄私，因是遣间者迎劳回军，言公将收责所募之帛，令占著田亩。瓦合之众信然，遂相惊譟，疾入为乱……”《新史》取以传绹。《实录》则云：“绹召诸卒，以诏书諭而遣之，发廩麦以赏众，皆怏怏而退。出垒门，有请辞监军者，而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素与绹隙，至是因以赏薄激之。散卒遂作乱。”似不如《新史》之有据。（第527页）

本条解题探讨山南西道军乱之原因：据神道碑和《新唐书·李绹传》，系将士误以为自己将被遣散而叛乱；据实录所载，则是将士因“赏薄”而乱。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第5744—5745页。

^②《大事记续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册，第527、560、560页。

王祹认为《新唐书》本传的记载出自神道碑,较实录更为可信。不过,此条大事记语虽简短但首尾俱全,王祹为何又要在解题中征引多种文献辨析军乱的原因呢?原来,《考异》曾探讨过这一问题,其先引《新唐书》,再引实录,并采信后者的记载^①。王祹显然是参考了《考异》的论述但无法赞同,因此又用神道碑等史料加以辨驳。可以说,整条解题都是将《考异》作为论述基础和反驳对象的。

(四)采自《册府元龟》等文献者

《续编》中有五条标作“实录”的文字不见于《考异》所引,而见于《册府元龟》^②。按《册府元龟》多采唐实录和国史原文,且在宋元时期流传较为广泛^③,其文本可能被王祹直接阅读和引用,并题作“实录”之名。不过此书有千卷之多,王祹也可能未得亲见和收藏,亦或是难以检索,而是从一些宋元史籍中辗转引用,唯其来源仍是《册府元龟》或唐实录。如《续编》卷六三元和十二年(817)“冬十月辛未,李愬袭破蔡州。癸酉,擒吴元济,寻伏诛”条解题:

按新旧《史》纪传、《实录》……初师道置邸东都,多买田伊阙、陆浑间,以舍山棚。(《唐实录》:东畿西南连(號)[號]、邓州,山谷旷而多猛兽,人习射猎而不耕蚕,春夏迁徙无常,俗呼山棚。)(第504—506页)

此处所引东畿西南俗呼山棚之事,还见载于《唐会要》卷六七《留守》、《册府元龟》卷四一三和六九六、《新唐书》卷一六二《吕元膺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等多种传世文献。但诸文献之表述和用词略有不同,与《续编》所引最为契合者,系《册府元龟》卷四一三:

东畿西南濒邓、號,山谷旷而多麋及猛兽,人人习射猎,而不利耕

①《资治通鉴考异》载:“《新传》曰:‘杨叔元素疾绛,遣人迎说军士曰:“将收募直,而还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库兵。绛方宴,不设备,遂握节登陴。或言缇城可以免,绛不从,遂遇害。’《实录》:‘绛召诸卒,以诏旨谕而遣之,发廩麦以赏众,皆怏怏而退。出垒门,众有请辞监军者,而监军杨叔元贪财怙宠,素怨绛之不奉己,与绛为隙久矣,至是因以赏薄激之。散卒遂作乱。’今从之。”(《资治通鉴》卷二四四,第7869—7870页)。按,“监军杨叔元”,《四部丛刊》影宋本《资治通鉴考异》作“监军使杨叔元”,与《大事记续编》所引相同。

②《大事记续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册,第467、494、503、504、512页。

③《册府元龟》于北宋修成后即刊板行世,南宋时又至少刊刻了三次,宋明时亦多经传抄(详参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影印说明,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蚕,春夏以其族党迁徙无常处,俗呼为山棚。^①

《续编》所引文字,完全被《册府》此条所涵盖。尤其是“耕蚕”一词,其他传世文献或作“事农”“耕种”“耕稼”等,唯《册府》此条作“耕蚕”,可能正是《续编》此条“唐实录”的史源。

(五)引用韩愈《顺宗实录》者

韩愈所撰《顺宗实录》五卷,因被收入《昌黎先生集》而成为唐实录中唯一流传至今者。《续编》也引用了《顺宗实录》两次^②,经文字比勘,确与韩愈文集一致。

首先看第一处,《续编》卷六二永贞元年(805)三月条:

壬申,追陆贄、郑余庆、阳城等赴京师,贄与城已卒。寻赠贄兵部尚书,谥曰宣,左散骑常侍。(以韩愈《实录》修)(第494页)

《顺宗实录》载:

(永贞元年三月壬申)追故相忠州刺史陆贄、郴州别驾郑余庆、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韩皋、前谏议大夫道州刺史阳城赴京师……而陆贄、阳城皆未闻追诏而卒于迁所……(七月丙子)赠故忠州别驾陆贄兵部尚书,故道州刺史阳城左常侍。^③

二者完全吻合,唯《续编》“谥曰宣”三字为《顺宗实录》所无。按“谥曰宣”三字之后的“左散骑常侍”显然指阳城而非陆贄,因此三字或原作“赠阳城”之类,系在传抄中产生漫漶缺损,又因后人误补所致。

第二处见于《续编》卷六三元和元年“秋七月壬寅,葬丰陵,庙号顺宗”条解题。其首云“按新旧《史》、韩愈《顺宗实录》”,检解题中未见载于两《唐书》的文字,有“于父子间慈孝交洽无嫌,每以天下为忧”“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以奸佞相次进用。延龄尤狡险,判度支,务刻剥聚敛,以自为功,天下皆怨怒。每进见,候颜色,辄言其不可。至陆贄、张滂、李充等以毁谴,朝臣悚惧。阳城等伏阁极论,德宗怒甚,将加城等罪,无敢救者。独开解之,城等赖以免”等等(第496页)。检《顺宗实录》原文^④,与之略同。

^①《宋本册府元龟》,第1058页。

^②《大事记续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册,第494、496页。

^③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二、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02、713页。

^④《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一,第694页。

《续编》两次引用《顺宗实录》均特地标明韩愈之名,这或许是由于韩愈名声之大,也可能是因为王祹所见并非单行本实录,而是韩愈文集。

四、《大事记续编》中独见的晚唐实录

《续编》征引的四十条唐实录,除前述三十三条还见于其他传世文献的征引以外,尚有七条晚唐实录系《续编》中所独见^①。其中武宗朝实录三处、宣宗朝实录两处、昭宗朝实录两处,下文分别辨析之。

(一)《武宗实录》三条

1.《续编》卷六六开成五年(840)正月条:

(武宗)以仇士良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以《实录》修)(第531页)

仇士良任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之史实,亦见于《仇士良神道碑》及《旧唐书·武宗本纪》^②。然《神道碑》仅云开成五年而无月份,《本纪》仅云开成五年二月封仇士良为楚国公,皆不言仇氏除授二官的具体时间。此条实录所提供的信息是独一无二的,可补史书记载之阙。在仇士良的把持下,武宗于开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帝位,半月内便任仇氏为掌管宫禁宿卫之长官,又带最高阶之散官,更可见仇氏当时权势之大。

2.《续编》卷六六会昌四年(844)八月“戊申,加司徒李德裕太尉、卫国公”条解题:

《武宗实录》:甘露之变,王涯、贾餗等横罹大祸。至会昌已易代矣,朝廷不能因事洗涤,明其无罪。羽、庠非投迹强臣,莫全其躯,至是不幸。已为潞卒所杀,而复声其罪,以逆为名,识者知德裕之及祸矣。(第538页)

文宗朝甘露之变时,王涯、贾餗被权宦仇士良杀害,时论冤之。武宗会昌年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欲自称留后以叛,部将郭谊杀刘稹及王羽(王涯族孙)、贾庠(贾餗之子)以向朝廷自赎。而宰相李德裕诏

^①《大事记续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册,第531、538、539、540、541、574、576页。

^②郑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曰:“开成五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封楚国公。”(《文苑英华》卷九三二,第4905页)《旧唐书·武宗本纪》载:“二月,……以开府、右军中尉仇士良封楚国公。”(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584页)。

称“逆贼王涯、贾餗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①，仍不为王涯、贾餗二人平反。《续编》引《实录》谓“识者知德裕之及祸矣”云云，为诸文献中所独见。

3.《续编》卷六六会昌四年冬十二月“再贬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牛僧孺为循州长史，湖州刺史李宗闵流封州”条解题：

按《实录》：初，僧孺、宗闵亦尝交连为声援，一旦以谋危社稷远窜，时论冤之。余见《通鉴》。（王涯、贾餗之徒，为士良所陷，至于族灭。德裕以李训尝陷己，怒及涯辈，子孙避祸逃窜，德裕方日以逆徒。

则所谓宗闵、僧孺谋危社稷之罪，庸可信乎？）（第539页）

此条实录云牛李党争之背景下，牛僧孺和李宗闵二人遭受李德裕迫害之情形。其后又有王祜本人的按语，意谓李德裕因与李训素有嫌隙，故而在李训、王涯、贾餗和他们的子孙遭受宦官迫害后，不能为他们平反，反而仍以逆徒视之（参见上条）。那么牛僧孺、李宗闵身为李德裕的政治对手，二人所谓的“谋危社稷”之罪自然是李德裕的罗织，不足为信。由此可见宋敏求、王祜对李德裕结党偏私之指责。

（二）《宣宗实录》两条

1.《续编》卷六七会昌六年三月甲子“帝（武宗）崩于大明宫，太叔（宣宗）即皇帝位，改名忱”条解题，长篇讨论了宣宗即位前是否曾流浪江湖、削发为僧的问题。解题首先征引《考异》的论点：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和尉迟偓《中朝故事》中关于宣宗秘密出宫、流浪江湖为僧的记载属于“鄙妄无稽”，因而不予采信。其后征引《景德传灯录》和“宋敏求补《宣宗实录》”，指出韦昭度、尉迟偓之说并非毫无依据：

然释氏《传灯录》具载宣帝为僧时问答之语，则其尝浪迹江湖明矣。即位之后，追仇前事，至于武宗诸子皆不保其终。宋敏求补《宣宗实录》谓：“自大中后，皆宣宗子孙继世，故唐人不敢道。”则昭度、偓辈所纪，未可以其鄙妄而弃之也。（第540页）

所谓“宣帝为僧时问答之语”，见《景德传灯录》卷九，“唐宣宗问禅宗何有南北之名。师对曰……是日辩师对七刻，赐紫方袍，号圆智禅师。仍敕修天下祖塔，各令守护。”^②不过，“赐紫方袍”“敕修天下祖塔”云云，恰恰表明宣宗当时手握权力，绝非流浪之人，因此这一记载并不能作为宣宗为僧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1页。

^②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刻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3册，第89—91页。

的依据。宋敏求补《宣宗实录》则称唐人讳言宣宗的真实身世,意谓宣宗确曾流浪江湖。此论虽不一定符合史实,但代表着宋敏求等宋人的史观和史评,可备一说。

2.《续编》卷六七大中二年(848)“秋九月甲子,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条解题:

《实录》:九月甲子,敕德裕“动多诡异之谋,潜怀僭越之志”,又云“擢尔之发,数罪无穷,载窥罔上之由,益验无君之意”。帝素恶德裕,及是谴斥,命内外制各撰词,而择用者乃翰林学士令狐绹所作。余见《通鉴》。(按《实录》:“会昌中,皇子益王、宪王已长,议策立之际,德裕必当有语及之,故深忤宣宗意,朋党挟吴湘事以希上,指卒远贬之。夫德裕之相武宗得君如此,其专也;宣宗之怨武宗如彼,其深也。宣宗既立,德裕固难立于其朝矣。况白敏中、崔铉辈,抵掌戟手,构成其罪,顺流抑坠,其势然尔。”宋敏求谓德裕以请立二王,忤宣宗之意,必有所据云然也。)(第541页)

此处所引《实录》实际上有两处:第一处是宣宗谴斥李德裕的诏令^①,王祐谓此诏出自令狐绹之手;第二处是分析李德裕失势的原因在于其“请立二王”,深忤宣宗之意。第二处明确标明了宋敏求之名,系出自宋敏求补《宣宗实录》无疑。而关于第一处所云令狐绹撰写诏令之事,唐代史籍中并无明确记载,唯宋初钱易《南部新书》云:“大中中,李太尉三贬至朱崖。时在两制者皆为拟制,用者乃令狐绹之词。”^②此说或是钱易、宋敏求等北宋史家的一致看法,载入补《宣宗实录》后又为《续编》所承袭。

(三)《昭宗实录》两条

1.《续编》卷七十天复元年正月“神策军将孙德昭等讨乱,帝复位,刘季述等伏诛。黜太子裕为德王”条解题:

《实录》:刘季述知崔胤遣使告朱全忠,欲尽杀两司官,以泼醋为号,后即弑逆于东内,挟少主而专大权。(第574页)

此段《实录》详言刘季述叛乱之过程。《新唐书·刘季述传》亦有类似的表述:“是时季述欲尽诛百官,乃弑帝,挟太子令天下。”^③然而本传“乃弑

^①此诏令又见于《旧唐书》卷十八《宣宗本纪》(第624—625页)、《唐大诏令集》卷五十八《李德裕崖州司户制》(中华书局,2008年,第308页)等。

^②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丁,中华书局,2002年,第45页。

^③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5895页。

帝”一语似乎是指刘季述已将弑帝付诸实践,语义不甚明了。而《实录》“以泼醋为号”等语详细描述了刘季述弑帝之计划和具体行动,又有“崔胤遣使告朱全忠”一句,展现了刘季述计划败露的原因,语义显明且历史细节更加丰富。

2.《续编》卷七十天复元年春正月“东平王全忠陷绛、晋二州”条解题曰:

按《实录》:全忠既服河朔三镇,欲窥王室,篡代之谋益露。以李克用在太原,惧兵犄角,乃袭河中。(第576页)

此条《实录》言朱全忠叛乱之缘起,《旧唐书·昭宗本纪》亦有类似记载:“时朱全忠既服河朔三镇,欲窥图王室篡代之谋,以李克用在太原,惧其角逐。是月,全忠令大将张存敬率兵三万,由含山袭河中王珂。”^①但其言“欲窥图王室篡代之谋”略有不通,或有阙文,《续编》所引《实录》之“欲窥王室,篡代之谋益露”则文义明白,可供校勘《旧唐书》之文字。

(四)七条佚文的性质和价值

以上七条独见于《续编》的晚唐实录是何种性质?是王祚亲眼所见吗?按,《武宗实录》在南宋仅余“会昌元年正月、二月”一卷残本(据表1《郡斋读书志》栏),武宗朝以后则无唐人所修实录。以上七条标注“实录”的文字皆载武宗朝以后之史事,又不涉会昌元年正月、二月之事,可知是后人补撰唐实录无疑。就贾纬、宋敏求的两种补实录而论,如前所云,宋敏求补实录在宋代虽有散失,但流传相对较广,而贾纬《唐年补录》因在功能上为宋敏求补实录所替代,故而在宋末可能已经完全亡佚,被王祚阅读或转引的可能性更小。况且,《唐年补录》的性质虽是补实录,但包括《通鉴考异》和《续编》在内的史籍征引《唐年补录》时一般径题“唐年补录”之名,不会与“实录”或“补实录”相混淆^②。相反地,《续编》中的两条《宣宗实录》皆明确提及宋敏求之名。因此,合理的解释是,《续编》中所见七条晚唐实录皆为宋敏求所补撰。

^①《旧唐书》卷二十上,第772页。

^②《资治通鉴考异》征引30余次,除题“唐年小录”“唐年补纪”各一次外(或系笔误),其余皆题作“贾纬唐年补录”或“唐年补录”,且常有同时引用“唐年补录”和“实录”的情况。《大事记续编》征引《唐年补录》仅一次(卷六六,《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册,第532页),系从《资治通鉴考异》中转引,且此条同时转引了《实录》。

此外,《续编》征引武宗朝以后的晚唐实录共有十二条,除独见的七条以外,据上文所考,还有四条转引自《考异》,一条转引自《容斋随笔》。若王祹能够亲眼见到补实录原本,应当不会从他书转引。同时,《续编》引书所标出处虽不甚严谨,但绝非毫无根据的捏造杜撰、虚标书名,而是大多能够从传世史籍中找到转引的痕迹。这七条补实录应当亦不例外,是从前代文献中转引而来,只是这些文献今日也已亡佚,难以考索具体出处。

观察七条补实录佚文的内容,第一、六、七条为陈述史实,第二、三、四、五条为阐发史论。实录之体裁,本应以阐述史实为主,不该有过多的评论,今存韩愈《顺宗实录》即是如此。但宋人补撰实录时则不必墨守这一体例,其中对宣宗身世、李德裕人格的评论,以及对牛李党争等一些史事细节的推测,皆是史评、史论性质的文字。这也反映出宋敏求补撰唐实录乃至宋代史学的一大特色,即阐发评论和追求义理。《续编》本身也继承了这一史学传统,征引了胡寅、王师古、朱熹、唐仲友、吕祖谦等诸多宋儒的史论和佚说,是探讨宋代史学尤其是南宋以来金华学派的重要材料^①。《续编》中的七条补实录佚文,或许就是从宋人的史论著作中转引而来。

五、余论

王祹的编年体通史《大事记续编》征引了大量珍贵的唐宋文献,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但也存在引书出处名不副实、征引一书却标注引自多书等不严谨的情况。除个别条目内容与引据文献不合以外,并未发现有意作伪的情况。《续编》中有四十条标注为“实录”或“以《实录》修”的文字,实际上皆为从《资治通鉴考异》等史籍中转引,并非王祹亲见。不过,其中七条宋敏求补晚唐实录已不见载于其他传世文献,故对补充唐人事迹、释读两《唐书》语义模糊之处、考察宋敏求补撰唐实录的体例仍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续编》引唐实录佚文的详细考察,也能够对唐实录的流传情况和亡佚时间作新的推测;宋末时,武宗以前的唐实录大体仍存,宋敏求

^①已有学者利用《大事记续编》辑佚宋儒史论。详见蔡崇禧:《李焘佚诗文拾补》,《古籍研究》2009年上下合卷,第186—188页;阮廷焯:《陈瓘通鉴约论辑》,《大陆杂志》第六十六卷(1983年)第三期,第46—48页。

补晚唐实录或有部分亡佚,贾纬《唐年补录》可能已完全散失。至元末王祜编撰《续编》时,唐实录、补实录和《唐年补录》的原书或许都已难得见,可能均亡于宋元之交的战火之中,《顺宗实录》以外的诸本唐实录皆没能流传至明代。

《续编》名不副实的标注方式实际上也是古书引书的常态,元代同时期的文献中尤为如此。与《续编》几乎成书于同时同地^①的宋濂《诸子辨》,广征博引辨伪二十余部子书,实则是大量转引、承袭《文献通考·经籍考》^②。又如,元大德间骆天骧纂《类编长安志》征引唐实录十余次,卷首亦开列“唐实录”等二百余部引用书目。然而此书内容绝大部分袭自宋敏求的《长安志》,在引书上“有的只是把宋《志》引用的书名照抄过来,骆氏本人并未直接读到原书、从原书引用。有的则是化一书为若干书”^③,与《续编》十分相似。由此可见,在面对《续编》等古书征引的珍贵佚籍时,应当在审慎考察真伪的基础上再作利用。《续编》尽管标注文献出处并不可靠,但因其成书较早,所见颇多,仍不失为保存唐宋佚籍的宝库,在辑佚、考史和考察文献存亡等方面,依然有待发掘和利用。

本文撰写得到罗韞哲等同门的帮助,《文献》匿名外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杨永政,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版本目录学。

①宋濂自云,“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日坐环堵中,块然无所为,乃因旧所记忆者,作《诸子辨》数十通……第以家当屡徙之余,书无片牍可以稽质”(宋濂:《潜溪后集》卷一《诸子辨》跋,《宋濂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6—277页),极言其写作时资料之匮乏。

②详参顾颉刚:《论〈通考〉对于辨伪之功绩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7—38页;全卫敏:《周氏〈涉笔〉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1期,第89—93页。

③黄永年:《述类编长安志》,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附录,中华书局,1990年,第334页。